

书评书介

## 国际移民与发展：相互依存三方共赢 ——联合国2006年系列报告述评

李明欢

(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7)03-0066-09

2006年9月14日, 联合国首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会”在纽约总部成功举行, 共计127个成员国派出了包括一位副总统、47位部长级代表在内的大批高层官员与会。回首2006年联合国的活动议程, 围绕这一重要会议的召开, 从联大主席到秘书长安南均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联合国各专门委员会相继发布一系列重要报告, “国际移民与发展”成为近年来联合国的一大热点话题, 而且, 联合国大会明确提出的“各国政府合作营造移民自身、移民原居国、移民接纳国三方共赢”的目标, 也已在政治层面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国际移民与发展”为何被如此醒目地提上联合国讲坛? 国际移民对当代世界具有什么意义? 联合国在国际移民时代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职责? 而且, “国际移民与发展”对中国有何意义? 本文选择联合国围绕这一主题于2006年发布的四个重要文件, 剖析其所揭示的深刻意义, 探讨其对中国的特殊启示。

[收稿日期] 2007-04-15

[作者简介] 李明欢, 女,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厦门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课题“发达国家国际移民政策比较研究”(04BMZ015)的成果之一。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及编辑对拙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联合国在2006年发布的以“国际移民与发展”为主题的主要文件及召开的重要会议包括: (1) 联合国世界银行2006年度报告:《2006全球经济展望: 汇款与移民的经济意义》。(2) 2006年4月,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工作者的国际迁移》报告。(3) 2006年4月3日至7日,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39届会议召开,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向大会提供的主题文件《世界人口监测: 聚焦国际移民与发展》。(4) 2006年5月18日, 联合国第60届会议发布文件:《全球化与相互依存: 国际移民与发展》。(5) 2006年6月, 为筹备拟议于同年9月的高层对话会, 联合国“国际迁移与发展研讨会”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安南发表关于促进国际移民与发展的重要讲话。(6) 2006年7月12日, 联合国第61届会议举行关于“大会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非正式咨询会”, 主题是如何确保移民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权得到尊重, 如何在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应对挑战。(7) 2006年9月14—15日, 联合国首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会”在总部召开。(8) 2006年12月14日, 秘书长安南发表“国际移民日致词”。其中第一项即世界银行报告, 笔者已经另文进行评述(详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在此不再赘述。

## 一、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人口、国际移民与发展

2006年4月3—7日，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以“国际移民与发展”为主题，召开第39届会议。按照委员会的要求，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向大会提供了主题文件：《世界人口监测：聚焦国际移民与发展》（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人口监测》）。

该报告的主要特点是以当代世界人口发展态势为背景，审视国际移民人口在地区分布上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分析移民人口的年龄、性别、教育、从业构成，并就未来国际社会如何在国家、区域及全球等三个不同层面上，有效制定国际移民的相关政策法规，提出意见建议。

《人口监测》报告提供了当今国际移民流动的翔实数据（详见表1）。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世界移民的绝对人口总数增加了3600万。就增长比例而言，则从1990—1995年的年均增长1.4%上升到2000—2005年的1.9%。而且因为通过跨国迁移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实现个人的理想和希望，是众多普通民众走上移民道路的基本动因，因此，经济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社会福利好的国家，自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北美接纳的外国移民数增长了1690万，欧洲增长了1470万。2005年全球1.91亿跨国移民中，60.5%（1.15亿）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三分之一在欧洲，四分之一在北美。在中东石油国家，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外国劳动力也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三国，外国劳动力在本国劳动力市场总量中所占比例高达82%—90%（第13页）。

表1 国际移民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1990—2005）

主要地区	国际移民人数（百万）		增加数（百万）	国际移民分布比例	
	1990	2005		1990	2005
全世界	154.8	190.6	35.8	100.0	100.0
较发达地区	82.4	115.4	33.0	53.2	60.5
较不发达地区	72.5	75.2	2.8	46.8	39.5
最不发达地区	11.0	10.5	-0.5	7.1	5.5
非洲	16.4	17.1	0.7	10.6	9.0
亚洲	49.8	53.3	3.5	32.2	28.0
拉美与加勒比	7.0	6.6	-0.3	4.5	3.5
北美洲	27.6	44.5	16.9	17.8	23.3
欧洲	49.4	64.1	14.7	31.9	33.6
大洋洲	4.8	5.0	0.3	3.1	2.6

资料来源：《人口监测》第4页。

《人口监测》依次列举1990年和2005年全球接纳外国移民最多的前20国。在前后两次排名中，高居首位的一直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移民接纳大国，美国1990年接纳外国移民总量占全世界移民总数的15%，2005年又上升到占20.2%；德国在1990年排名中名列第六，2005年上升到名列第三。在前一次排名中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国家“异军突起”：西班牙在2005年猛升到第十

本节所引用《人口监测》一书的资料出处，均根据原著英文版在括号内标明页码。

位，阿联酋进入第13位，排名第16的意大利、第19的约旦和第20的日本，也都是2005年新进入前20名的移民接纳国（第5—6页）。

国际移民是移民群体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国际移民流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且以过去20年南欧与拉美移民流向的逆转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经济强劲增长，大批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劳动力纷纷北上打工。但是，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南欧经济跃升，西欧经济疲软，不仅原本北上打工的南欧人相继返回原居国，而且还吸引了来自非洲、亚洲的新移民纷纷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以外国移民的净接纳数为例。西班牙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年均接纳移民3.3万人；进入90年代下半期后则翻了一番，增加到年均接纳6.6万人；进入21世纪后，又猛增到年均接纳外来移民48.3万人，其中65%来自发展中国家，35%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第7页）。拉美的情况则正好是个反证。上世纪中叶之前，拉美地区以移民流入为主，但随着该地区传统的移民接纳国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相继出现政局动荡，经济滑坡，不仅外来移民纷纷离境，本国民众也出现向外迁移浪潮。

近15年来国际人口跨境流动量在最不发达地区也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十余年来，随着阿富汗、卢旺达等曾经产生大量跨境难民的最不发达国家局势渐渐回归正常，共有2100万难民通过各种途径返回本国。由联合国难民署记载在案的难民总数已经从1990年的1590万下降到2005年的920万（第5页）。

在发达国家，人口构成上难以逆转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促使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将如何选择、接纳外国移民的问题，郑重提上议事日程。《人口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来移民平均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总量的四分之三；而按目前欧洲的人口构成测算，未来欧洲地区净移民接纳量必须比目前增加三倍以上，才能保证欧洲拥有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足够劳动力。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历来对外来移民相当排斥，可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日趋严重，日本不得不在1990年至2005年的15年间接纳了大约120万外来移民，目前全日本移民总数已达到创纪录的200万人（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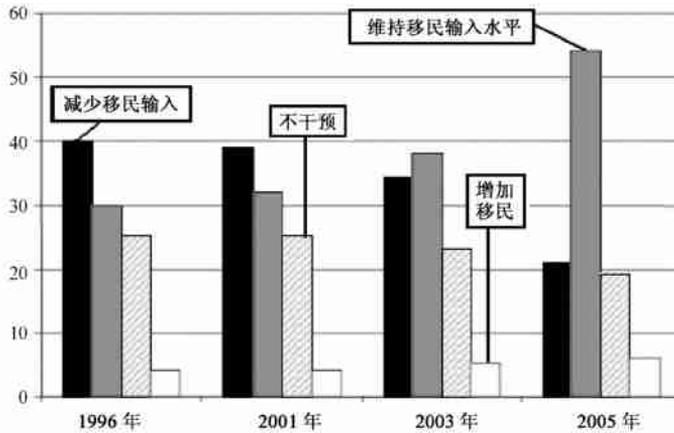
在劳动力富足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以增加本国获益已被列为重要国策，如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当代劳动力输出大国，均已成立专门机构管理移民工人的跨国迁移问题。

鉴于移民流向及发展趋势的变化，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均处于重新考量与修正之中。自1996年以来，希望减少接纳国际移民人数的国家数大约减少了一半，而希望维持移民输入水平的国家从30%上升到大约55%，明确希望增加移民输入的国家也有所上升。显然，适度接纳外国移民对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良性促进作用，已成为相当一部分政府的共识（详见图1）。

《人口监测》对相关国家的移民政策进行了介绍、比较与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相关国家在移民政策的基本取向上主要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第一，积极促进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2005年全球共有75个国家制定了促进外国人融入本国社会的具体政策，比1996年时的52国增加了近50%。在发达国家中，四分之三以上国家专门定有促进移民融入的政策。融入的前提是移入国政府应当保证外来移民在本国国内享有平等待遇，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保护其基本人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而外来移民则应当学习掌握当地国语言，了解尊重当地国民情风俗，遵守当地国法律法规。然而，如何将增进社会和谐的美好理想与政策付诸实施，真正有效地促进具有异文化背景的移民融入本国社会，仍然是困扰相关国家政界、学界的重要问题。

第二，各国都争相加大吸引专业人才的力度。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明确制定了吸引高级人才移民本国的鼓励性政策，其中以美国为最。美国共制定了三个特许“专门人才”入境的计



资料来源：《人口监测》第 29 页。

图 1 各国政府移民政策变化趋势 (1996—2005)

划，并有一项针对高技能劳工的计划，从 2000 年到 2003 年，按此计划入境的移民年均达 20.1 万人。2000 年经合组织国家总共接纳 25 岁以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移民约 2000 万人，其中约 85 % 集中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六个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担心“智力流失” (brain drain) 曾经是发展中国家阻止本国技术人才（包括留学生）外移的一大原因。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许多国家政府意识到在一定条件下，智力不流动的结果有可能是“智力浪费” (brain waste)，适当流动却可能带来较高层次上的“智力获得” (brain gain)。例如，那些技术人才一批批外移的国家，如果能够促使任职它国的技术人员与原居国保持适当联系与交流，将可能分享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成果，获得信息、技术乃至资本回流的正效益。因此，不仅接纳国希望接纳更多的专业移民，输出国也在争取从专业人员的流动中获益。

第三，鼓励移民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其原居国。目前全球共有 72 个国家制定了鼓励外来移民返回其原居国的政策。对于高福利、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是最为有利可图的移民政策，身强体壮的外来移民将其最富创造力的青壮年时期贡献给移入国后，返回其原居地养老，无疑将大大减轻移入国的社会负担。然而，当外来移民在移入国工作、生活十几数十年后，他们与移入国必然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要再返回原居地，谈何容易。因此，这一政策同样存在如何付诸实施的具体问题。

总之，《人口监测》报告的基本观点是：应当在全球层面应对国际移民带来的新挑战。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理应为拟议中的“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切实有效地协调解决国际移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 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全球化与相互依存

2006 年 5 月 18 日，以秘书长安南的名义，联合国正式发布 A/60/871 号文件，题为：《全球化与相互依存：国际移民与发展》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相互依存》)。该报告反复强调的主旨是：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上升的世界，国际移民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系纽带。通过移民流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同步实现经济上的良性发展。国际迁移在全球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大理想途径 (第 22 页)。

本节所引用《相互依存》一书的资料出版，均根据原著英文版在括号内标明页码。

《相互依存》报告首先以世界银行、人口基金等各分报告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对当代国际移民的构成、流向、途径、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全景扫描。报告强调移民为目的国和原居国双方所创造的积极效益，同时亦逐项分析在移民的权益保护、社会福利及共处融合等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该报告最重要的特点，是以联合国秘书长的名义，敦促各相关国家政府充分履行管理与保护移民的职责义务，倡导在地区乃至国际层面建立规范性的国际移民管理框架，充分发挥联合国协调国际移民问题的共享平台作用。

就移民接纳国的政府职责而言，该报告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国际迁移对于许多国家（包括接纳国和移出国）的社会发展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迁移并不是相关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恰恰相反，如果处理得好，相关国家都可以从移民流动中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共荣。报告指出，政府应当在国家层面上宣传移民的特殊贡献，使接纳国的普通民众认识外来移民在弥补本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缺失方面的贡献，使移出国民众认识迁移的合法途径和应有的职责权益。虽然相关国家政府完全有权决定允许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进入本国，或允许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离开本国，但与此同时，相关政府也必须在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标准的前提下，以合法、安全和公平的方式善待移民，确保他们获得平等的权益和机会。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制定准则，宣传包容、公平、平等意识，并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与实施机制（第 72—73 页）。国际移民应当纳入全球性宏观扶贫战略。因为事实上，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既是世界各国依存度增强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不断地提升各国的依存度。

由于移民流动性已大大增强，因此，如今移民的“社会融入”已经有了与既往不同的涵义，它不仅意味着接纳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应当帮助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同时亦要求接纳国应当尊重和适应外来移民。换言之，当代的“社会融合”已不再是永久定居、宣誓入籍的代言词，而是意味着移民与移入国社会双向互动的社会过程，是移民自身、移民接纳国乃至移民原居国都应当分享和承担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

表 2 关于国际移民的国际法律文书一览表

类别	法律文件名称	生效年份	签约国	
			签约国家数	占联合国成员国百分比
移民工人	1949 年国际劳工组织移民就业公约（1949 修订本）（第 97 号文件）	1952	45	23
	1975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心处于恶劣环境中的移民及促进移民工人获得平等机会与公平待遇公约（补充条款）（第 143 号）	1978	19	10
	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益的国际公约	2003	34	17
人口贩运	2000 年关于预防、禁止和严惩贩运人口尤其是严禁贩运妇女儿童的国际公约	2003	97	50
	2000 年关于打击通过陆、海、空贩运人口的议定书	2004	89	46
难民	1951 年国际难民公约	1954	143	73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1967	143	73

资料来源：《相互依存》第 78 页（资料截至 2006 年 4 月 19 日）。

由于国际移民是超越国界的行为，加强各国协商、提高各国共识尤为重要。报告对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涉及国际移民的重要文件，进行梳理归纳，罗列了其中最重要的七个文件（详见表 2）。然而，报告同时指出，虽然这七个文件都非常重要，但在联合国成员国中的认可程度相当有限。其中，认可程度最高的是 1951 年的“国际难民公约”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 1967 年难民地位议定书，签约国为 143 个，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 73%；其他法律文书签约国比例都在半数以下，最

低仅为 10%。报告大力呼吁各国加强沟通，提升签约国比例。

报告反复强调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移民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报告以安南秘书长的名义特别指出：“我坚信，在（国际移民）这个最典型的全球问题上，联合国的作用无可替代”（第 11 页）。由于国际迁移涉及的国家至少在两个以上，任何单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多多少少都具有跨国乃至全球性的影响，因此，只有联合国才能构建当今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最佳平台。从打击跨国人口贩运，到移民养老金、福利费的跨国携带，都只有通过国际性协商方有望达成必要共识。联合国鼓励世界各国建立有效的数据信息分享机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需求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实现全球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使国际迁移成为造福于全球的长期性事业。

### 三、联合国人口基金 2006 年度报告：妇女与国际移民

2006 年 9 月，以 Maria Jose Alcalá 为首的人口基金专家小组，在全面综合考察当今世界数千万跨国谋生普通女性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发布了新一年的世界人口报告（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6），题为：《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A Passage to Hop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以下简称《妇女与国际移民》）。

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伴随着当代国际移民的滚滚浪潮，国际移民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目前全球移民人口女性总数约有 9500 万人，比例高达 49.6%，真正成为全球移民的“半边天”（第 5 页）。在印尼、巴西、多米尼加等国的出国务工者中，女性比例都超过 70%，在菲律宾、斯里兰卡的出国务工人员中，女性比例也达到三分之二（第 23 页）。

当代国际移民出现女性化趋势的原因何在？首先，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女性得以进入更为广泛的就业领域，推动了女性的流动。当新科技发展进入产业领域使得“身强力壮”的男性不再具有从业优势后，“心灵手巧”、“听话服从”的年轻女性、尤其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女性，就成为“价廉物美”的劳动力而具有相对“从业优势”。

其次，高收入国家的护理服务业成为吸引低收入国家女性的一个就业大市场。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均为本国国民提供全面的社会医疗服务，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则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机构与设施承受空前的需求压力，从医院、老人院到面向各类残障、智障人士服务的社会机构，对护士和护理人员的需求量空前激增。然而，护理业是一个被认为既脏又累、且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行业，少有当地年轻女性愿意从事这一工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已成为发达国家护理业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例如，美国目前有四分之一的护士和护理人员是出生于外国的移民，而到 2020 年全美还需补充 100 万名护士，可以预见，其中大部分将不得不由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移民来填补。

再者，高收入国家本国国民生活水平、福利待遇的提高，使得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纷纷将“家务”转为雇佣劳动，对“女佣”的大量需求形成了又一个跨国劳动力大市场。最突出的事例之一是，菲律宾训练有素的百万“女佣”跨国务工，已经成为国际劳务市场的一个“品牌”，也成为给菲律宾国家大量创汇的“民族英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全国雇佣的外籍家佣在 100 万人以上，阿联酋平均每户雇佣三个佣人，西班牙每年将近 50% 的移民配额系直接发给“家政工作者”（第 51 页）。

最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定位，使女性在大多数国家成为餐饮、旅馆、娱乐、旅游、电话中心等服务业的主要从业人员，而某些男性以女性（尤其是异国女性）为欣赏、消费乃至玩弄对象的欲望，则推动了以性产业为主的某些特殊行业的发展。在欧盟各成员国从事性产业的移民女性可能达到 20 万至 50 万，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被人口走私团伙从欧洲以外地区运送入欧洲的。某些性产业的操纵者们为满足其客户的猎奇心态，在亚洲、欧洲以及北

美、南美之间形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地下网络，通过引诱、交换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女性进入本地性产业以赚取更多利润（第 26 页）。

在对跨国女性流动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妇女与国际移民》一书对女性移民的贡献给予了比较客观、积极的评价。例如，1999 年斯里兰卡总计收到本国移民从国外汇回的钱款约 10 亿美元，其中 62% 以上来自女性移民的贡献。在菲律宾，90 年代后期大约每年收到 60 亿美元汇款，其中三分之一汇款人是女性。而且，虽然女性移民总体收入水平低于男性，但由于女性对于原居地的家庭更有责任感，因此她们汇回家乡钱款占其收入的相对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在政治上，不少女性还从跨国谋生的经历中，提高了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增强了权利意识。

然而，希望、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离开熟悉的故土走向异乡，需要勇气、毅力和途径，也可能遭遇不可预测的风险与危害。女性移民除了与男性一样可能在异国他乡受到经济剥削、种族歧视之外，还可能遭到性骚扰、性暴力、性虐待，并可能面对高艾滋病感染率风险。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目前全球遭受人身束缚与虐待的“现代奴隶”可能多达 1230 万人，其中以妇女儿童为绝大多数：在受到过度经济盘剥的跨国移民中，56% 系妇女儿童；在被迫进入性产业的移民中，98% 是妇女儿童。女性移民遭受性侵害的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心理、情感压力是女性跨国迁移需要面对的又一问题。在菲律宾，800 万人在国外工作的现实使得跨国家庭成为常态，许多年轻母亲在异国日日夜夜为他人抚育孩子，照顾老人，却终年不得与自己年幼的子女见上一面。因此，从性别视角研究女性移民问题务必注意到：发达国家女性得以享受高质量悠闲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移民从劳力到情感的高度付出。

《妇女与国际移民》强调指出：数十年来，女性移民犹如一条虽日益拓宽、却一直在悄无声息中滚滚流淌的大河（A mighty but silent river）。因为如果说跨国移民因为是新世界里的陌生人而面对各种潜在风险与障碍的话，那么，进入异国劳动力市场的女劳动者，则是跨国移民群体中更为弱势、也更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从长远看，妇女在迁移中，而且还将继续迁移。报告呼吁，女性移民的辛苦付出应当得到承认，她们的权益应当得到保障，女性移民的权益与要求，应当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

#### 四、联合国首次“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系列文件：以三方共赢为目标

2006 年 9 月 14 日，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正如会议文件所明确指出的：此次会议旨在通过会员国之间多方位、多层面的广泛对话，探讨如何有效制定相关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移民的负面影响，提高效率。

安南在致词中首先高度评价国际移民，指出：“移民是个人希望战胜逆境、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大无畏行动。”接着，他意味深长地提及：“仅仅几年之前，许多人还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以国际移民为主题的会议能够在联合国召开，因为各国政府都不敢将这个本国国民极为敏感的问题提到国际讲坛上。可是，现在你们都坐到了这里，我感到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对移民能够帮助移入国和原居国同时改变面貌而欢欣鼓舞；越来越多人理解各国政府可以合作营造移民自身、移民原居国、移民接纳国三方共赢的局面。”

为期两天的高层对话会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召开圆桌会议：第一，探讨国际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探讨如何维护国际移民人权，打击跨国人口贩运；第三，探讨“提高移民汇款

---

此次会议的主要文件公布于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migration/>

Address of Mr. Kofi Annan, Secretary-General, to the High-Level Dialogu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September 14, 2006,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ume 40 Number 4 (Winter 2006): 963.

效益”等实际问题；第四，探讨建立区域性伙伴关系、增进移民效益的最佳途径。先后有来自127个会员国的140多名代表在各次会议上发言，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高层对话会为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如何使国际移民实现效益最大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会议的系列文件充分展示相关国家对此的高度认同：面对国际移民时代带来的新挑战，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对国家边境进行严格有效管理是国家的主权所在，但仅仅依赖安全管制措施，并无法消除非正常迁移。因此，已经和正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应当制定合理的政策引进外来劳动力，以平衡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国际移民、发展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应当尊重所有移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反对种族歧视，制止仇外心理，防止对外来移民的社会排斥。

这次高层对话会将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移民问题上开始进行认真合作的重要标志。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国际移民问题就会与我们共存。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国际移民人数还会继续上升，与这一最具活力之人口现象密切相关的机遇和挑战也将层出不穷。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常设性的“国际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虽然它不具备做出任何有约束力决定的权力，但将为国际社会交换意见、为促进各国政府之间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提供一个非正式的场所。在比利时政府代表提出主办下一届高层对话会的意向后，大会做出决议：2007年将由比利时政府主办新一届“国际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

## 五、“国际移民与发展”对中国的意义和启示

回首2006年联合国围绕“国际移民与发展”开展的活动与颁布的文件，结合中国自身国情，认真解读全球国际移民的最新动向，关注国际移民政策的要旨与趋势，具有特殊意义。

在中国，国际移民问题长期未受到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的必要重视。近年来虽有学者开始将华侨华人问题置于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但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需求相比较，研究依然明显滞后。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同途径跨境迁移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对于近20年在中国民间社会底层基本自发形成的跨境移民潮，认真总结其经验，剖析其利弊，预见其动向，势在必行。笔者以为，通过对上述联合国系列文献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层面上，从“国际移民与发展”的新视角，以“三方共赢”为目标，对当代海外华人社会及新移民的发展态势与时代意义，深化认知。

首先，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直接表现之一，是劳动力市场所呈现出的高度跨国化趋势，是大量普通劳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劳动力跨国就业的大潮流。在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跨国流动的劳动力中，既有居于劳动力市场上端、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专门技能的专业人士，更有大量居于劳动力市场下层、仅有一般技能或完全没有特殊技能、但年轻力壮、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普通劳动者。市场为劳动力提供的机会，劳动力在特定“国家”范围内可能期盼的收益，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导向；而“国家”层面的移民政策与劳动力民间流动所具有的跨越障碍的特殊活力，则处在持续不断的博弈之中。由于不同群体的期待值不同，不同条件下市场需求的构成不同，因此，目前国际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来的是你来我往的交相互动的流动状态。越来越多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也是移民输入国或移民中转国。以今日中国为例，如果说中国人走向世界已为人所共知的话，那么，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北京望京小区出现的“韩国社区”，在浙江义乌、绍兴长期居住的数以万计的韩国、阿拉伯商贩群，在广州秀山楼周边日益为当地人所熟知的非洲人生活工作圈，还有许多因婚姻而移居中国的外籍配偶们则鲜为人知。目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来自境外、国外的移民已达数十万（有的报道甚至认为上百万）。一个不争

---

2007年“国际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已定于7月9日至1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相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的事实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移民也在源源进入中国；中国劳动力在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同时，境外外国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劳动者也在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外国移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新群体，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密不可分的标志之一，自然也成为我们在关注传统海外华人社会及新移民的同时，也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之一。

其次，在“国际移民与发展”的宏观视野下，需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单向性的“移民融入”，而是双向或多向性的“移民融合”。换言之，当代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既不是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居高临下的单向要求，也不是移民作为外来者、边缘人而不得不无条件遵从的社会政策。在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前提下的社会融合，应当是移民群体、移入国社会乃至移民原居国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过程，它既包含外来移民“入乡随俗”的主客观要求，亦包含移民群体保持其自身特色以增强竞争力的权力，包含从移民原居国到移民接纳国都应当分享和承担的社会职责。移民一旦完全同化于移入国社会，就意味着其自身特性的丧失，也意味着其特殊竞争力不复存在。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中国学者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侨务政策所应承载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将有益于正确理解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承乃至创新中华文化的时代意义，进而认识“跨国化生存”现象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及其对于社会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新挑战。

第三，联合国相关文件强调的“三方共赢”应当成为移民政策及研究的主导。在正确政策的扶持下，国际移民将有可能对移出国和移入国都做出贡献，并且移民自身也从中获益，但三方共赢的前提是移民本身的权利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任何国家政府，在从进入本国的外来移民身上获取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必须在尊重移民人权的基础上，让移民群体乃至他们的原居国分享移民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任何国家政府，在从外出移民向家乡的反哺性汇款、投资中获取额外收益的同时，也必须举国家之力，合法合情合理地为劳动力跨国流动疏通渠道，在海外移民遭遇权益伤害时，理直气壮地为其护法维权。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国政府都不能企图一味坐享移民收益而不负维权职责，也不可能试图靠强权完全阻止移民流动。

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国际移民问题就会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共存。当代中国人的跨境流动，与国际大趋势相互吻合，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表现。而且从长远看，不同类型的人口跨境流动势必一步步趋向常态化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依存、共谋发展的程度势必与日俱增。虽然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一切并不会成为人口迁移不可逾越的障碍，国际移民已成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绵延不绝的联系纽带，在此意义上，国际移民对于当今“和谐世界”发展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不容低估。